

日本在华报纸《闽报》(1897-1945年)创办考略

毛 章 清*

日本の在華新聞『閩報』(1897~1945年)創業についての考察

Researches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 Pao (1897-1945): A Chinese Newspaper Published by Japanese in China

MAO Zhang Qing

内容摘要: 日本在华中文报纸中,《闽报》具有创办时间早、存续时间长和社会影响力广这些特点。从福建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在福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报,《闽报》对福建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本研究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对《闽报》的一般状况,比如创办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等作初步地考察;其二是对《闽报》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作进一步地研究分析。本文着重对前者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闽报》、创办时间、发行、版式

摘要: 日本の在華中国語新聞の中で、『閩報』はその特徴として創業時期が早く、存続時間が長く、広範な社会的影響力があった。福建省新聞業発展史の角度からみて、同省において継続時間が最も長く、影響力が最も大きかった外国新聞として、同省社会の各領域に対する『閩報』の影響は無視できないものがある。本研究は二つの部分からなる。第一部分は、創業時期、紙面配置、発行、創業者など『閩報』の一般状況についての初歩的考察、第二部分は、『閩報』の具体的内容とその影響に関するさらに突っ込んだ研究と分析である。本文は前者の分析と検討に重点を置く。

キーワード:『閩報』、創業時期、発行、紙面配置

Abstracts: The Min Pao is an early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in China with a long-time existence and wide social influ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s history in Fujian, the Min Pao, as a foreign newspaper with the longest time and the biggest influences, has unignorable effec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Fujian society.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parts. First, it is to do an initial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is newspaper, such as the time of establishment, the format, the publication, and the first publisher, etc. Second, it is to do some further analysis on its contents and influenc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rst part.

Keywords: The Min Pao, time of establishment, publication, format

1、研究缘起

日本在华报刊肇始于1882年¹⁾。随着日本政府控制中国地区的势力增长,日本在华报业也随之成长。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报纸主要在长江流域、华北地区和台湾地区发行;在此之后,随着日本势力逐渐渗透东北,日本报纸在东北地区也渐次落地生根。据统计,从1882年至1945年,日本在华创办的报纸计有200种之多。从量方面来说,日本在各国在华外报中独领风骚²⁾。

* 中国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在中国华南地区,日本在华报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广州和香港4个城市,前后总共创办了7份报纸,其中福州、厦门和香港各有两份,而广州只有一份³⁾。在这些报纸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创办于1897年、终刊于1945年,在福州的中文报纸《闽报》。这份报纸“甚至被称为(日本)在华南的唯一大报纸”,长期以来,“作为日本的言论机关,而奋斗不辍”⁴⁾。这体现了《闽报》在日本在华报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著作用。

由此可知,日本在华报纸中,《闽报》具有创办时间早、存续时间长和社会影响力广这些特点。从福建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在福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报,《闽报》对福建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

关于《闽报》的专文研究,主要有中国台湾梁华璜的《台湾总督府对“闽报”及“全闽新日报”的操纵策略⁵⁾》和日本中下正治的《台湾总督府与闽报⁶⁾》这两篇文章。梁华璜依据档案资料指出,作为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先锋的台湾总督府,把新闻政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体的方法是,选择适当的报纸,或者给予补助经费,或者伺机予以收购,从而达到操纵和利用的目的。质而言之,《闽报》和《全闽新日报》就是台湾总督府在推进“南进政策”过程中的两枚“过海之卒”。中下正治从《闽报》的创办过程入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变。作者阐述了从福泽谕吉、内藤湖南到儿玉源太郎日本对福建工作的具体内容,说明了台湾总督府在《闽报》创办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总而言之,《闽报》的创刊是日本经略中国福建的产物。

本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第一手资料——上海图书馆摄制的缩微胶卷《闽报》原件⁷⁾,进一步探讨作为台湾总督府经营的报纸,《闽报》在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方面是如何无条件地支持和贯彻日本对中国福建的政策,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和情报机构的,从而明确作为在华的日本报纸与日本国策实施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对《闽报》的一般状况,比如创办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等作初步地考察;其二是对其具体内容及其影响作进一步地研究分析。本文着重对前者的分析与探讨⁸⁾。

2、《闽报》的创办时间

1、创 刊

《闽报》创刊于何时?⁹⁾现存最早的一份《闽报》是发行于1898年1月4日的“第六次”¹⁰⁾。这一期报头上写道:“本报馆设在南台泛船浦广东馆东边,自第二次起改每礼拜三、礼拜六印发两次,全年计一百纸。”这则材料表明了《闽报》的发行周期和报馆地址。但是,这一天既非礼拜三,又非礼拜六,而是“礼拜二”。需要说明的是,《闽报》的前身就是创办于1896年的《福报》,而《福报》则是“本报每礼拜拜二、拜五印出二次”¹¹⁾。也就是说至少《闽报》“第六次”之前的发行,可能并没有依据报头所载的发行周期,而是沿用《福报》发行的时间惯例。据此往前推算,《闽报》的确切创刊时间应当是在1897年12月17日。

还有可资佐证的文献。日本东亚同文会主编的《对华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闽报是1897年12月,收买了原来由福州人发行的福报,改名为闽报,将发行权转移至日本人手中后成立的。”¹²⁾这里没有提及具体的创刊日期。中下正治在《台湾总督府与闽报》中说道,《闽报》“在明治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行了第一号。”¹³⁾由于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我们无从知道这个论断的出处。但是,《闽报》创刊于1897年12月17日这一天当属无疑¹⁴⁾。

2、休 刊

《闽报》存续40年，经常出现休刊又续刊、停刊又复刊的现象。在特定时节，比如“阴历年关例假”，《闽报》一般会在头版刊登“休刊启事”，停版七天¹⁵⁾。从《闽报》发行的序号延续性和时间断层性的比较，也确证了这点。如第506期是1903年1月17日，而到第507期时，已经是2月11日了，中间停刊将近一个月。1911年1月26日《闽报》第1538期在头版头条还刊登了《闽报终刊辞》，云¹⁶⁾：

“……本报辱承各界诸君惠顾多年，并蒙指示南针，无任感激之至。奈际此洪钧已转，凤律将更，各界诸君，皆有所事事。是以本馆即就此次起，暂行停版。俟明正初旬，仍行扩张报幅，以饱诸君之眼。兹惟敬请诸君，少留精神，以备明春洞观全世界之时势。是则鄙人所深望者也。”

当第1539号印刷发行，已经时至1911年2月9日了。至于20世纪20年代，《闽报》停而复刊，更是频仍。根据已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24年7月至1928年4月，《闽报》停、复刊就多达十余次。从中不难体察《闽报》生存状态。

3、闭 刊

《闽报》的闭刊时间，未见文献确切记载。现存所见最后一份《闽报》是1937年5月14日印发。一直在时代的缝隙中挣扎的《闽报》，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也走到了历史的末路¹⁷⁾。

3、《闽报》的创办人和经营者

在《闽报》的策划和创办过程中，中岛真雄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岛何许人也？“中岛是‘支那浪人’的长老，长州阀的宠儿，在当时（明治三十九年）的政界和军界都是有相当声望与权势之人。¹⁸⁾”

当时在福州，由于《福报》屡次刊登排日的文章，日本海军军令部决意收购《闽报》。为此，受到海军军令部委托的军令部福州驻扎员前田彪和上海驻扎员宗方小太郎具体操办这件事。当时在福州策划台湾总督府对岸工作的中岛真雄，由于不能如愿左右总督府，就让前田和宗方出面，与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商量，让其参与此事。因为中岛认为，《福报》问题是日本对中国华南的整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这才有了宗方小太郎和井手三郎由福州渡海台湾，游说乃木之事的发生¹⁹⁾。

具体的过程，《宗方小太郎日记》有详细的记载。依据1897年的宗方日记，这一年的7月，海军省提及收购《闽报》一事；直至同年10月，宗方小太郎和井手太郎才由福州渡海抵台，拜会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在达成相关协议之后，11月，宗方由台湾回到日本。同行的井手则返回福州，与在福州的前田彪合作，从事创业。12月，《闽报》创刊²⁰⁾。

顺便提及，中岛真雄、井手三郎和宗方小太郎，三者都是成立于1897年的日本同文会的倡议人。1898年11月2日，同文会和同样成立于1897年的东亚会合并，会名改称“东亚同文会”。该组织在北京、汉口、上海、福州和广州等地，各设支部，其中宗方小太郎为汉口支部主任，井手三郎为上海支部主任，中岛真雄则是福州支部主任。从新闻事业角度来说，宗方创办和经营的报纸有《汉报》、《闽报》和《时报》等，宗方还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社长；井手则是上海《同文沪报》社社长，之后还创办了《上海日报》；中岛更是《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和《蒙文报》等报纸的创办人²¹⁾。前田彪、井手和宗方还是同乡，都是日本熊本县的“支那浪人”²²⁾。这些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支那通”。

《闽报》的具体创办过程,《对华回忆录》是这样叙述的:1897年12月,日本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的会员宗方小太郎和井手三郎在台湾总督乃木希典的支持下,与居住在福州的前田彪合作,收购了由黄乃裳创办于1896年的《福报》的发行权,更名为《闽报》,“以后的经营,概由前田负责”²³⁾。由此可知,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和前田彪三人都是《闽报》的创办人,尤其是前田彪,更是《闽报》实际上的经营者,即所谓的“闽报馆主人”。

1903年元旦前后,《闽报》多次刊登了这样一则“新春祝福”的报纸广告²⁴⁾:

“恭贺
新禧敬叩 大清国福州闽报馆主人
大日本 前岛真 顿首
辱知诸君 大日本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台端”

这里的“前岛真”就是前田彪。在甲午战争期间,前田彪以翻译的身份从军,受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委托,从1897年开始以谍报员身份驻在福州,但是在表面上是三井物产的代表,名字也改名为前岛真²⁵⁾。

从1897年12月17日开始,前田彪任“闽报馆主人”长达18年之久,直到1915年4月6日去世为止。18年来,《闽报》一直是以前田的个人企业的名义经营的;以前田的去世为契机,台湾总督府计划把《闽报》作为直辖机关报,最终以台湾日日新报社购买的形式把《闽报》收归旗下²⁶⁾。

1915年,台湾总督府指派《台湾日日新报》社长赤石定藏(1915—1918年)接办《闽报》;以台湾报界这么重要的人物去经营《闽报》,可想而知台湾总督府对《闽报》的重视;《闽报》的政治色彩亦可见一斑。赤石定藏之后的负责人,“经由中山宽太郎、镰田正威、中曾根武多等人,迄今现任社长松永荣为止,作为日本的言论机关,而奋斗不辍。”²⁷⁾

《闽报》社长一职,皆由日本人担当,而且在前田彪之后,《闽报》社长由《台湾日日新报》派遣,这成为一个惯例。但是在闽报馆,也有台湾和大陆人被聘用担任编辑和记者,甚至是主笔的。比如,《福报》创办人黄乃裳把报纸的发行权转让给前田彪之后,在1897年12月至1898年3月这段时间内,“由前田彪任馆长,黄乃裳作主笔,继续经营下去。”²⁸⁾在《闽报》历史上,还有一位“著名的主笔”陈涵玉,于1918年去世,这甚至还一度影响了《闽报》的发行量²⁹⁾。

《闽报》馆既是一个新闻机构,也是一个情报机关。日籍人员中有间谍分子,在台湾和大陆人的编辑、记者中,也有被利用进行间谍活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闽侯县党部所属《青白论坛》社社长陈逸云,即是《闽报》的记者,他受当时报馆馆长松永荣的指使进行特务活动,抗战后被军统秘密处死³⁰⁾。

4、《闽报》的版式演变

1、版式演变

《闽报》脱胎于《福报》。1896年4月28日,《福报》由福建闽清举人黄乃裳独资创办。这是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1897年5月,《福报》因经济亏损严重而停刊³¹⁾。1897年12月17日《闽报》创刊时,距离《福报》停刊已经半年有余了。

从1897年至1937年,四十年间《闽报》的版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闽报》创刊至1906年11月报馆购买了活字印刷机之前³²⁾。

这个时期的版式，因袭了《福报》，从报头的设计到栏目的设置，从装帧形式到版面大小几乎如出一辙。这个阶段的《闽报》长约28厘米，宽约27厘米，一页两版，对折四面，每次四页八版十六面，相当于大八开大小的杂志；其中第1版是“论说版”，第2版开始是“新闻版”，第7版、第8版一般是“广告版”。单面印刷，双栏，竖排，无断句，从左往右翻阅。对折式装帧，折叠后形同奏折状如书册。这就是《闽报》所称的，“本报将所登事件，略为分类，隔圈摆印，以便阅报诸君订成册。³³⁾”

最晚从1899年11月8日第189期开始，《闽报》的报头有些微妙的变化。左边纪元由“西历某年某月某日”改为“大日本明治某年某月某日”，还增加了落款——“日商闽报馆发售”。最晚从1902年11月8日第486期开始，在每份报纸的第一、三、五、七版的右上角增加了“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第三种郵便物认可”的字眼。最晚从这期开始，版式形成固定的模式。

还有，最晚从1904年5月21日第636期，首次出现了“不取分文”的“附张”（相当于“号外”）——《日俄战争详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直至这一年6月4日第640号，连续每期都有“附张”，共发行五次（第640期之后出现长时间缺失）。

第二阶段，从1906年11月活字印刷机印刷至1915年10月《闽报》改出日刊³⁴⁾。

这个时期的版式，相对第一个阶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已经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报刊的形式，进入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形式阶段。现存实物最近的是1909年2月2日第1239期。这时的《闽报》长约27厘米，宽约38厘米，对开双面印刷，相当于小四开大小，确切地说就如同当前的晚报大小。依然是竖排，无断句，但也有些栏目，比如文艺附刊类的尝试着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每页四栏；一版称之为“一页”，每张四页，通常为“本报八页”计两张，也有“本报拾贰页”计三张，比如1909年2月2日的第1239期。这期的第四版，还有“本馆全景”的插图。还是这一次，又出现了“附张”，共两页，内容分别为“闽省官场一览表”和“轶抄节录”。从装帧形式上看，版面依次由左往右翻阅，属于内叠式装帧。

第三阶段，从1915年10月《闽报》改出日刊直至1937年5月14日第8672期，这是所见的最后一期。

这个时期的版式，与前面两次又有所不同。现存实物最近的是1921年11月19日第4074期。从版面篇幅上看，这时的《闽报》长约38厘米，宽约49厘米，对开双面印刷，如同当前的日报，已经完全是现代大报形态了。从装帧形式上看，版面依次由左往右翻阅，依然采用内叠式装帧。竖排，但已全面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般每天“日刊六页”，六版一张半，每页则分十栏。

这里还有几个细节问题。最晚从1934年7月8日第4852期开始，在《闽报》第一、三、五、七版的顶端中间的“闽报”二字，以英文“THE MIN PAO”标注；而第二、四、六、八版，则还是标以中文“闽报”二字。还有最晚从1925年7月12日第5150期开始，版式未变，但报头上的“闽报”二字的字体已改变。此外还出现了中缝广告。

2、出版周期

《闽报》的出版周期和版面数量也随着版式的变化而变化³⁵⁾。《闽报》在历时40年的出版过程中，出版周期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分别经历了“周二次刊”、“周三次刊”和“周六次刊”（也就是“日刊”）三个阶段；这在《闽报》的发行序号和发行日期的逐一对比中，可以得到证实的。

1898年1月4日的《闽报》第六期报头写明：“自第二次起，改每礼拜三、礼拜六印发两次，全

年计一百纸。”由此可知,创办之初的《闽报》当是周二次刊无疑。在“周二次刊”阶段,《闽报》一直保持着“每次四页八版十六面”的版式。

从1906年11月之后,由于报馆购买了活字印刷机,《闽报》每星期开始出版三次。1909年2月2日第1239期《闽报》报头写道:“本年每礼拜出报三次,凡拜二、拜四、拜六皆出报日期,礼拜日停印,计全年出报一百五十张。”在“周三次刊”阶段,《闽报》在报头一般都会标明“本报八页”,或“本报十页”;但也有“本报十二页”,如1909年2月2日的第1239期;甚至“本报廿页”的时候,如1910年2月10日的第1389期。必须指出的是,“周三次刊”阶段的《闽报》版面状况,前者相对普遍,后者实属罕见。也就是说一般都是每天出版两张八版。

1915年10月,《闽报》改为日刊。1921年11月19日第4074期表明,《闽报》在报头上标有“日刊四页”、“日刊六页”或“日刊八页”的说明。也就是每天出版一张四版、一张半六版或两张八版。这意味着《闽报》进入了“日刊”阶段。顺便提及,《闽报》的出版规律是一周出版六期,星期一休刊。确切地说,可以称之为“周六次刊”,而不是指每日发行的“日刊”。这在当时应当是一个普遍现象。

一般说来,报纸的出版周期是相对固定的,版面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版式或版面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但是,相比较而言,版面数量存在更大的变数。1926年5月12日,《闽报》一位名叫“余园”的编辑,写了一篇“增刊抒感”,以此表明增刊的目的与意义³⁶⁾。

“今日惟本报增刊之第一日。记者于役此间为时不过五稔,亲见本报增刊两次。一为十三年七月由四面增刊为六面,一即今日由六面增刊为八面。记者信增刊之可喜,不徒在本报营业之隆昌,尤在社会求知欲之增大。诚以增刊之举,绝非一时豪兴。本馆同人迫于社会之需求,几经审虑而后出此。至社会何以有此种需求,则求知欲大致然也。……”

3、印刷业务

《闽报》在创刊之初,报纸的印刷业务主要委托给由美国人经营的福州美华书局印刷。最初,《闽报》几乎每期都用大号字体刊载“本报馆告白”。其中最后一条是这样写的:“士大夫著稿及各项书籍,预付本局摆印者,祈将原稿到局核商,其价较各处格外公道。”³⁷⁾这里是指称“本局”而前面所声称的“本报馆”,所以两者应当有所区别;“本局”是指“美华书局”无疑。这和《福报》是一致的。1896年5月15日第6期《福报》报头显示,《福报》由“福州美华书局印发”。不过,为什么《闽报》在“本报馆告白”中要为美华书局刊登广告呢?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报馆和书局是合一的,彼此有契约关系。据记载,直到1906年11月,《闽报》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活字印刷机。日俄战争后,由于日美对立的局面,《闽报》和美华书局随时存在着破坏印刷契约的可能。恰好在这一年,《闽报》又获得了台湾总督府的资金资助,于是购买了活字印刷机,开始一周发行三次³⁸⁾。

闽报馆还面向社会,承印各项业务。且看20世纪初叶在《闽报》头版常见的“本馆广告”:“本馆广告:本馆新办新式机器,大小铅字,各色花边,一切具全。惠顾诸君,如要刊印书籍、传单,请移玉至本馆商议可也。闽报馆敬白。”³⁹⁾

20世纪20年代,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闽报馆采用最新印刷技术。这段时间,《闽报》也经常刊登“本馆启事”⁴⁰⁾:

“本馆特备各种印刷机器,以应各界印刷品之需求,向已日增月累。兹特改用电器机关,尤为灵捷,出品各国更见快速,固不特印面鲜明,花纹精致,足以快阅者之心目也。价格低廉并不昂贵,诸君有以印刷品相委托者,请即来馆面商。”

5、《闽报》的发行销售

1、销售地点

我们先从销售地点分布的变化来考察《闽报》的发行。《闽报》第6期的报头就标明其发行地点：福建省内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漳州三市，省外有上海、汉口两处，台湾有台北、台南、台中三地，国外销售点主要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和檳榔嶼。时隔不久，除了加强在福州、厦门和漳州的销售网点之外，《闽报》在省内其它城市也增加了销售点，而且还设点于北京、天津、澳门和南昌等地，东南亚一带也增设了吕宋这个销售点，正如《闽报》在“请登告白招贴”中所自诩的，“本馆中国各省及日本、台湾、南洋等处均有售报处”⁴¹⁾。

1906年11月，《闽报》改为周三次刊。《闽报》的销售地点有所调整，实现了由中心城市的销售点向全省销售网的转变。从报头刊载的“各处代售”地点表明，《闽报》主要以福州市为辐射点，以福建省为大本营，销售触角伸向各个县城，几乎遍布省内。至于外埠，则要“酌加寄费，凡邮政所到之处均可按次寄到”⁴²⁾。《闽报》的销售点主要设在会馆、商铺、洋行、书店和报馆之中，甚至在民宅之中也设有售点。随着业务的发展，1910年《闽报》还设立了分馆⁴³⁾。

进入20世纪20年代，由于版次的变更，在《闽报》的报头上，已经取消了有关“各处代售”的字眼，代之以“各埠均有代售处”的说明；在1927年12月21日的头版“本报营业部启事”中，《闽报》甚至还呼吁：“本市及各地如有愿充本报寄售处者，希望向本馆接洽，毋任欢迎！”⁴⁴⁾

尽管《闽报》在销售地点上，尤其是中国国内其它省市的销售地点上有变更，但是，从《闽报》报头的“报资邮费告知”中我们可以知道，《闽报》从未停止过向台湾、香港、南洋和日本等地的发行。在《闽报》报头，关于这些地方的报资、邮费，常常有这样的说明：“惟属香港、南洋邮费倍算”⁴⁵⁾、“台湾及日本各埠日金六十钱”⁴⁶⁾等。据此可知，作为一份日本人在中国东南创办的报纸，《闽报》销售地点不能说不广，不能说没有针对性。

2、销售方式

《闽报》销售方式主要是派送和代售两种。《闽报》1898年1月4日第6期刊登大号字体“本报馆告白”云：“在省城厢内外阅报诸君，祈向送报人声明姓名、居址登簿，以便按次遣送不误。外埠托经手人代售，照远近酌加寄费。”

派送方式主要是在省城福州，有专门的“送报人”负责。省城之外的地方，主要是委托“经手人”代理销售，每年的端午和中秋是结算报资的时候。《闽报》在这两个节日前后，经常刊登“午节收资广告”和“秋节催收报资广告”。

常用的广告语是这样的：“外埠代售诸君鉴：启者，兹届端阳，所有代售报资，希即汇银前来，以资周转。如寄邮票，一概退还。预此奉告，务祈谅之为幸！”这是“午节收资广告”。“秋节催收报资广告”的广告语往往是这样的：“外埠代售诸公鉴：启者，秋节伊迩，所有代售报资，务望于月内迅即催收，汇银前来。如寄邮票来抵，一概退还。预此声明，祈望为原谅！”

派送人和经手人除了销售报纸之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接受社会投稿。《闽报》标榜“本报主意在开西学风气，凡地方新事有足长闻见作劝惩者录之”；因此，“所有荒唐琐褻及诽谤近于无名揭帖之件，概不阑入。”这里报馆声明稿件的取舍原则。“惠教佳章及新闻，祈寄各售报处转交；或即交送报人带下，拜登报端，以为世道人心之助。惠件或书爵名，或书别号，概照来稿。但登与不登，原稿统

乞恕免奉还。”这里报馆表明了投稿的方式和格式，如若是邮件，“外埠所有惠件，封面祈书：寄，福州南台泛船浦广东馆闽报馆主人收”⁴⁷⁾。

在甲报馆中销售乙报，而在乙报馆中又销售甲报，这种彼此销售的方法在当时应是一种常态。比如，1902年11月12日《闽报》在报头的“售报处”中就有这些报馆、杂志社和出版社代为销售《闽报》：澳门《知新报》馆、台北大稻埕建昌街《台湾经济》杂志社、台南活版社、京都《顺天时报》馆、天津法租界《大公报》馆、《同文沪报》馆、南昌派报处和新加坡《天南报》馆等⁴⁸⁾。

那么《闽报》有代销其它报纸吗？这里有一则重要的史料。1899年11月8日，《闽报》用小号字体刊登一则“本馆代理各报声明”广告⁴⁹⁾：

“启者：中国维新某先生，出居日本。适该地殷商巨贾在横滨居留，创设《清议报》馆，延之主持笔政。从此可以振笔直书，畅谈国事。有心时务者，所宜先睹为快也。兹寄在本馆代售。

又有天津《国闻报》、汉口《汉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澳门《知新报》、《天南新报》，均托本馆代理。诸君阅者，祈先到本馆交银挂号以后，按次照派尊处。此布！”

这里的“中国维新某先生”应当是指梁启超无疑。《闽报》代理各报，究竟是什么样的报纸呢？要么是维新派的报纸，比如《清议报》、《知新报》和《天南新报》；要么是日本人经营的报纸，比如《汉报》、《国闻报》、《亚东时报》和《台湾日日新报》。这和当时的政治思潮有关。《汉报》、《国闻报》、《亚东时报》和《同文沪报》等都是在1900年左右，颇受中国人注目的中文报纸，这些报纸的言论几乎都是同一步调，同情维新派。因为这些报纸与东亚同文会都有渊源，而东亚同文会是极力支持康梁变法维新，所以这些报纸倾向于维新派是自然的趋势⁵⁰⁾。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闽报》的旨趣。报馆兼营销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报纸，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行上互为提携，在舆论上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以此达到影响社会之目的。在当时的发行条件下，这是一种很好的传播策略。

3、资费标准

《闽报》的资费标准，如同报纸的发行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掣肘，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确切地说，《闽报》的价格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里引用《闽报》“本馆营业部启事”加以说明。这是刊登于1927年12月21日《闽报》头版的“本馆营业部启事”⁵¹⁾：

“本报素以促进文化为宗旨，自发行以来垂二十余稔，内容力谋改良，消息力求灵通；而对于交割，则非增加边幅而不提高，凡所以为阅者诸君减轻负担计也。无如比来物价日昂，工值亦日增，本报适应社会之潮流，认为有改定价格之必要。兹决自明年一月一日七，照左列报资计算；一面仍将内容积极刷新，以答读者诸君之雅意。……”

这里《闽报》叙述了报馆的宗旨，成就与方向。但是《闽报》认为“随行就市”乃“适应社会之潮流”，当然“改定价格”是有必要的了。

尽管从纵向来说我们很难把握《闽报》价格变化的规律，因为促使价格上扬的有社会因素，也有经营原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参照其它报纸的定价，作一个静态的横向比较。我们来看一则史料。还是1899年11月8日的《闽报》“本报代理各报声明”的广告，当时各报的销售价格是：“《国闻报》零售每张十五文；《汉报》零售每张十三文；《清议报》周年三十三册，价银四圆五角，闰月加三册银四角，另加邮费；《知新报》周年价银四圆，零售每册银一角五仙；《亚东时报》每册银一角五仙。”而这一天《闽报》的销售价格是：“全年计一百纸，报资洋银一元五角，零售每张

十七文，外埠酌加寄费。⁵²⁾”由此可知，相对于《汉报》的十三文、《国闻报》的十五文等报纸而言，《闽报》十七文的零售价格还是比较偏高的。

4、销售状况

《闽报》的销售状况究竟如何？在前田彪时代（1897—1915年），《闽报》的销量在一般情况下为300份左右⁵³⁾。但是，在日俄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人对战争的关注，《闽报》的发行量一度飙升至2000份，实属罕见。但是这种状况只存在于1905—1907年这段时间，以后有逐渐减弱的趋向；随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在1918年《闽报》的著名主笔陈涵玉去世，《闽报》发行量一下子减少到724份（其中有效份数667，免费散发配送的57份）⁵⁴⁾。根据《闽报》社长赤石定藏的回忆，在其负责经营的三年时间里（1915—1918年），曾经由当初的三百份增加到一千五、六百份，但是随后又锐减到三百份左右⁵⁵⁾。

1919年6月3日，《民国日报》刊载了“婴武”的《福州报界调查录》，对当时福州各类报纸逐一评点，其中对《闽报》是这样说的⁵⁶⁾：

“《闽报》，日本人所办，出版已十余年。每日专电，均由日本领事馆送登，消息尚灵。资本按月由台湾总督府发给，并由李后基每月津贴二百元。福州省城月售一千三百余份，外县约月售二百份左右。近日青岛问题发生后，退阅者甚多，亦一可纪之事也。”

尽管寥寥数语，但对《闽报》的历史与现状，性质与属性，都有客观地点评。由于《闽报》的许多消息由日本驻闽领事馆提供，又常在报上揭露福建各级官吏之丑，披露一些被地方当局封锁的新闻，因此发行量一度达到三四千份，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五四”运动中，福建民众一面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面揭露《闽报》的帝国主义立场，其发行量跌至四五百份⁵⁶⁾。

1932年，福建省发生“闽变”事件。《闽报》在言论上采用煽情报道手段，使平时发行量从平时的四、五百份，飙增为一千六百份；同年十一月，日销量达六千六百份，最高时为八千三百份，令人咋舌⁵⁷⁾。

根据1935年的调查，《闽报》销售量最高时为七千份以上，此前有一段时间保持在五千份左右，居福州各报之冠，后来逐渐又减为一千八百份⁵⁸⁾。

尽管《闽报》知名度很高，但是公信力和美誉度却很低，这是因为“日本人在福建所办的报纸，内容是满幅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惟恐中国不乱的记载，中间夹以宣传日本的伪善以及主张中日亲善等的文字，以迷惑中国人。⁵⁹⁾”1915至1918年出任《闽报》社长的赤石定藏亦，也认为“殆无阅读闽报之中国人”，“愿意登载广告之人亦皆无”；“既使基本销售量之三百份，亦经由当地日本领事之推介才有日本人及台湾人肯订阅者；实际上闽报因属汉文新闻，当地之日本人及台湾人能阅读者少，订阅之人实由劝说之下，情非得已者。⁶⁰⁾”1931年3月17日《福建日日新闻》在一篇《斥闽报》的社论中，称之为“专以造谣捣乱中国时局，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虎威以侵略为宣传”的一份报纸⁶¹⁾。

由此可知，从《闽报》销售状况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发行起伏变动较大；二是发行量的增减与中国内政演变和抗日抵制运动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6、小 结

本文主要通过1897—1945年《闽报》创办的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的梳理和考证，简略地勾勒出了《闽报》发展的概貌。

具体来说,《闽报》创刊于1897年12月17日,最初每周发行两次,地点设在福州南台泛船浦广东会馆东边。尽管经常出现休刊、停刊现象,但是直至1945年,《闽报》才宣告闭刊。中岛真雄是《闽报》创办的发起人和策划者,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和前田彪则是《闽报》的创办人,尤其是前田彪,更是《闽报》的经营者。前田之后的《闽报》社长同样由日本人担任,并且由《台湾日日新报》社派遣,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尽管也有中国人担任记者、编辑,甚至是主笔,依然改变不了《闽报》的性质。作为一个在华新闻机构,《闽报》还兼有情报机关的角色。

《闽报》版式的演变和印务的发展,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从版式来看,以报馆购买了活字印刷机为标志,《闽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版式的改变,《闽报》的出版周期也分别经历了“周二次刊”、“周三次刊”和“周六次刊”(也就是“日刊”)三个阶段。作为一份日本人在中国东南创办的报纸,《闽报》销售地点不能说不广,不能说没有针对性。从纵向来说,《闽报》销售价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参照其它报纸的定价,从静态的横向比较而言,《闽报》还是比较偏高的。《闽报》销售状况起伏变动较大,这跟中国内政演变和抗日抵制运动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至于对《闽报》具体内容及其影响的分析研究,将另行撰文。

注

- 1) 关于日本在华最早的新闻事业,中国新闻史学界认为,日本人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日文报纸是1890年6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上海新报》;日本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华文报纸是1894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佛门日报》。(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17页和第三卷第8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9年版。)但是,郑翔贵依据《西国近事汇编》的记载,认为“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应可追溯到更早”,具体时间是1882年。《西国近事汇编》(壬午夏季卷)是这样叙述的:“上海日本商人新出报章一本,共28页,其中虽以贸易为主,然亦兼论国事及别种要情,嗣后按月一出。上海日商不多而竟能设报,殊属难得云”。(参见郑翔贵著《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台湾黄福庆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著作中论述了日本在华新闻事业的整体概貌,当中引述了日本中下正治的研究,指出“日本人最早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既不是《上海新报》,也不是《上海时报》,更不是《上海时事》或《佛门日报》,而是一八八二年创刊于上海的《上海商业杂报》。该报在发行之初是季刊,自第三号起才改为月刊,发行者是上海商同会。该报是以调查中国经济状况及介绍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主。”(参见黄福庆著《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211页。)
- 2) 根据张国良《1890—1939年日本人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一文记载,日本人“从1908年到1945年约半个世纪里,先后创办的报纸不下200种,平均每年近40种,远远超过其它外国人在华报纸的数量。它们遍布东北、华北、华中、台湾等地,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势力。”(载《新闻大学》1988年冬季号。)依据黄福庆的统计,除了台湾地区,自1882年至1939年之间,日本人在中国创办了141种报纸,就文字而言,有中文报、日文报、英文报和俄文报,其中日文报纸就达106种之多;就地区而言,东北地区有76种,华北地区有35种,长江流域有30种。(参见黄福庆:前引书,第274页。)根据台湾王天滨的叙述,日人据台时期(1895—1945年),台湾地区创办的各类报纸总共有55家。(参见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4页。)
- 3) 日本在中国华南地区创办的7份报纸分别是:福州两份,《闽报》(中文)和《福州时报》(日文);厦门两份,《全闽新日报》(中文)和《南支那》(日文);广州一份,《广东新闻》(日文);香港两份,《香港日报》(日文)和《南支那新报》(日文)。其中日文报纸5份,中文报纸2份。(参见黄福庆:前引书,第259—261页。)
- 4)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5页。
- 5) 梁华璜:《台湾总督府对“闽报”及“全闽新日报”的操纵策略》,载《台湾风物》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三期,1980年。
- 6) 中下正治:《从报纸看中日关系史——日本人在中国经营的报纸》之《第四章 台湾总督府与闽报》,东京,研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7—111页。
- 7) 上海图书馆摄制的缩微胶卷《闽报》,共有4卷,35毫米,缩率为1:14,原件藏于上海图书馆和福建省图

书馆。母片藏于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胶卷显示,现存《闽报》,包括完整的、缺损的、残破的等,剔除重复的部分,共有471号(次);其中完整的有332号(次)。从时间来看,胶卷起于1898年1月4日,终于1937年5月14日;相对集中的是在1902年11月8日至1904年6月4日,1909年2月2日至1911年5月27日;主要空缺的是1911年9月2日至1921年11月19日,1928年4月26日至1937年5月14日,这对了解这段时间的《闽报》,留下了缺憾。

- 8)《对华回忆录》和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中对《闽报》的叙述,是中国新闻史学界认识这份报纸的最为重要的参考文献。(胡道静著《外国在华报纸》,参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0页。)《福建省志·新闻志》中关于《闽报》的叙述,相对详尽。(参见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新闻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 9)这里有两种说法:“1897年12月”说和“1898年1月”说。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载:“日本人井手三郎和前田彪于1897年购得原由福州人出版的《福报》,于同年12月改办为中文《闽报》。”(参见方汉奇:前引书,第804页。)戈公振则指出:“《闽报》于光绪23年12月,发刊于福州,为日人报纸在华之第一种。”是年为1898年1月。(参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66页。)黄福庆也认为,“《闽报》于1898年元月在福州发行”。但在另一处,黄又写为“《闽报》(中文报,日刊)1896年元月创刊,创办人为宗方小太郎。”可是,紧接着在日本在华报纸编年表格中,在“创刊年代”栏,又称是1898年。由此可知,“1896年”当是印刷之误,应是“1898年”。(参见黄福庆:前引书,第21页、第258页、第262页。)
- 10)《闽报》早期称“期”为“次”,后期称为“号”。比如第6期称第6次,第4074期称“第4074号”。为了行文之便,在引用时统称为“期”。此外,《闽报》称“版”为“页”,比如“本报八页”即“本报八版”。
- 11)《福报》第6期,1896年5月15日(参见《福建省志·新闻志》“图1—8《福报》报头”,第22页。)
- 12)《对华回忆录》,第495页。
- 13)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6页。
- 14)黄福庆在日本在华报纸“编年表格”中,在“备注”栏中写道:《闽报》“前身为《福报》,1899年改现名,二次大战后停刊。”这里关于《闽报》报名的论述有误。最晚从1898年1月4日第6期开始,《闽报》一直沿用这个报名。(参见黄福庆:前引书,第262页。)
- 15)《闽报》第5869期,1928年1月20日。
- 16)《闽报》第1538期,1911年1月26日。
- 17)关于《闽报》闭刊有三种说法,分别是“1932年”、“1937年”和“1945年”。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中说,“近据闽侯的朋友告诉我,谓《闽报》已于去年八一三抗战发动后,自行偃旗息鼓。”是年为1932年。(参见杨光辉等编:前引书,第600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认为是“1932年停刊。”(参见方汉奇:前引书,第804页。)《福建省志·新闻志》是这样表述的,“抗战爆发后,日本领事馆撤回,《闽报》亦告停刊。”(参见《福建省志·新闻志》,第27页。)中村正治认为“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中国创刊的中文报纸中,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发行,一直持续至二次大战结束者,只有《盛京时报》与《闽报》而已。”(参见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7页。)由于没有发现确切的文献资料,本文依1945年之说为准。
- 18)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3页。
- 19)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3—105页。
- 20)参见冯正宝著《宗方小太郎评传——大陆浪人的历史作用》,第150—151页。从1897年5月《福报》的停刊到1897年12月《闽报》的创刊,已经历时半年有余。
- 21)《对华回忆录》,第469页、第493页。
- 22)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5页。
- 23)《对华回忆录》,第495页。关于《闽报》筹划与创刊的具体过程和历史细节,中下正治的《台湾总督府与闽报》和冯正宝的《闽报的发刊》都有相应地叙述。比对三者,还是《对华回忆录》言简意赅。
- 24)《闽报》第501期,1902年12月31日。
- 25)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5页;但是,梁华璜文章中又写作“前田真”。
- 26)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6页。
- 27)《对华回忆录》,第495页。
- 28)中下正治:前引书,第106页。但是,詹冠群在《黄乃裳传——维新志士·拓荒者·革命党人》中指出,1898年初,黄乃裳由福州赴北京参加春季会试,一直到1898年9月才返回福州。(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之“黄乃裳年谱简编”)黄乃裳有没有担任《闽报》的主笔?作为一个屡次在《福报》上刊登反日排日文章的报人,《闽报》为什么要聘请黄乃裳任主笔?《黄乃裳传》没有提及出任《闽报》主笔

一事。

- 29) 中下正治: 前引书, 第106页。
- 30) 《福建省志·新闻志》, 第28页。
- 31) 詹冠群: 前引书, 第33页。所谓“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 作者认为是根据《福报》的内容(以评论为主)和形式(每星期出版两次, 单张发行)来判定的。如果单以发行的时间为依据, 首推美国美以美会机关报(英文)《Chinese Recorder》为最早。但那是教会的期刊, 并非是近代意义上的报纸。
- 32) 中下正治: 前引书, 第106页。
- 33) 《闽报》第6期, 1898年1月4日之“本报馆告白”。
- 3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一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23页。《闽报》“1915年10月改为日刊”。
- 35) 关于《闽报》的出版周期问题, 相关的论述语焉不详, 多有出入。胡道静在《外国在华报纸》中提到, “闽侯有曾根武(多)办的《闽报》, 1897年12月创刊时, 本来是隔日刊, 1915年10月改为每日刊。”(参见杨光辉等编: 前引书, 第600页。)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这样记载, “同月(指1898年1月), 日人出版的中文双日刊《闽报》在福州创刊。……1915年10月改为日刊。”(参见方汉奇主编: 前引书, 第123页。)黄福庆在写道: “闽报原为二日刊, 民国四年十月改为日报”; 梁华璜则说: 1915年, 《闽报》“由原来之周刊改为日刊”; 王天滨认为: 1900年5月, 《闽报》“将日刊改为周刊, 再变成双日刊, 一周发行三次”; 1916年4月, “恢复日刊发行”。《福建省志·新闻志》叙述道: “民国3年(1914年)10月起, 改为日刊。”从上述可知, 1915年10月《闽报》改为日刊, 这个认识是大体一致的。
- 36) 《闽报》第5393期, 1926年5月12日之“增刊抒感”。
- 37) 《闽报》第6期, 1898年1月4日。
- 38) 中下正治: 前引书, 第106页。
- 39) 《闽报》第1240期, 1909年2月4日。
- 40) 《闽报》第5065期, 1925年3月31日。
- 41) 这里的论述, 综合了《闽报》1898年1月4日第6期、1899年11月8日第189期和1901年11月12日第487期的报头罗列的“售报处”。
- 42) 《闽报》第1239期, 1909年2月2日。
- 43) 《闽报》第1434期, 1910年5月31日。
- 44) 《闽报》第5848期, 1927年12月21日。
- 45) 《闽报》第1434期, 1910年5月31日。
- 46) 《闽报》第4074期, 1921年11月19日。
- 47) 《闽报》第6期, 1898年1月4日之“本报馆告白”。
- 48) 《闽报》第487期, 1902年11月12日。
- 49) 《闽报》第189期, 1899年11月8日。
- 50) 黄福庆: 前引书, 第288页。
- 51) 《闽报》第5848期, 1927年12月21日。
- 52) 《闽报》第189期, 1899年11月8日。
- 53) 梁华璜: 前引书, 第4页。
- 54) 中下正治: 前引书, 第106页。
- 55) 梁华璜: 前引书, 第4页。
- 55) 杨光辉等编: 前引书, 第454页。
- 56) 《福建省志·新闻志》, 第28页。
- 57) 王天滨: 前引书, 第47页。
- 58) 梁华璜: 前引书, 第5页。
- 59) 林云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之福建》, 载《民族杂志》第三卷六期1935年6月。转引自梁华璜: 前引书, 第6页。
- 60) 梁华璜: 前引书, 第6页。
- 61) 《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3月17日之社论《斥闽报》。转引自《福建省志·新闻志》, 第27页。